

岁月丛书

● 刘幼雪 著

从碎石 小路走来

● ● ● ● ●
育才「神童」
难忘的1941
九岁的研究生
爸爸的故事
我的外公杨尚昆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岁月 丛书

从碎石小路走来

刘幼雪
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碎石小路走来/刘幼雪著. -沈阳: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
1997.12

(岁月/刘朝兰,于耀先主编)

ISBN 7-5315-2808-8

I. 从… II. 刘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②革命传统
教育-青少年读物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5063 号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130 千字 印张:11 $\frac{3}{4}$ 插页:8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张雨门

插图:隋翰羽

封面设计:姚洪发

责任校对:王绍斌

版式设计:黄金娣

定价:(平)15.50(元) (精)20.50 元

序

孩子都盼着自己快些长大，其实，长大未必就是成熟，因此，看一看老辈人的生活经历确是十分必要的。

共产党员、爱国者信奉这样的格言：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；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：‘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（奥斯特洛夫斯基：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）

《岁月》丛书所展示的，是一些普通共产党员、爱国者的人生行程。他们都起步于鸡鸣风雨、暗夜如磐的民族危亡时刻。有的人，带镣长歌，血染红岩，怀着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，硬是将敌人的牢底坐穿；有的人，隐姓埋名，长期潜伏敌营，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，获取重要军事情报，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；有的人，还是个孩子，父亲就惨遭敌人杀害，她泪水未揩，便奔向了红星闪闪的延安……

《岁月》丛书的这些文字，均出自这些老战士之手，他们今天写下的作品，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积淀的，其中蕴含着深彻的人生感悟，闪动着独特的思想锋芒。

用文艺作品教育青少年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就是写老一辈的艰苦奋斗事迹。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，是弥足珍贵的教科书，因此我要对青少年读者们说：珍惜岁月，继往开来！

林默涵

1997年8月于北京

目 录

序	林默涵
寄人篱下	1
育才“神童”	11
难忘的 1941	44
九岁的研究生	87
魂牵梦萦的延安中学	119
初涉人世	153
为“土八路”争气	191
爸爸的故事	224
怀念外婆李伯钊	250

目录

我的外公杨尚昆	261
人生一页	283
“刘大和尚”	308
专职党务工作者	344

寄人篱下

一个三四岁、圆乎乎的小女孩，腆着肚子，瞪大眼睛，从泛黄的照片上怔怔地看着我。小女孩的脚下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身后是葱茏的树木和依稀可见的高楼大厦。很显然，这是在公园。如果不是送照片的亲戚指明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这个小女孩和自己联系起来。

照片上的我，梳着妹妹头，穿着手织的套头缀扣毛衣，短毛裤，短筒线袜，丁字小皮鞋。这是妈妈为女儿所做的精心打扮。按妈妈去世的时间推算，那时应该是在上海，

大约是 1934 年或 1935 年。是妈妈把这张照片寄到了外婆家。想不到，全国解放几十年后，它才又回到真正的主人手里。

这是我惟一的儿时照片。每当我凝视它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温暖。可惜，除了对这照片的感受外，和妈妈在一起的幸福，我竟一点也不记得，而记忆最深的却是在四川五婶家所遭受的凌辱。那是一段梦魇般的，却又无法抹掉的记忆。

1935 年秋，爸爸带着身患重病而又无钱医治的妈妈，还有我和弟弟次雪，由上海回四川。途中，船行到云阳附近，妈妈就不幸离开了人世。妈妈去世以后，爸爸东渡日本，便把我和弟弟次雪分别寄养到亲戚家。

我在四川北碚五叔家住了大约三年时间。五叔和五婶有一个女儿，我好像是专门为了侍候这位公主才来到这个家庭的。五婶是我妈妈的远房堂妹，上过初中，平时穿着打扮十分时髦，也许是家里有点钱的缘故，她生性骄纵蛮横。五婶对自己女儿温柔备至，而对寄养在她家的侄女却像个凶神恶煞，稍不遂心，不是骂，就是打。实际上，

我成了这个家的小丫头。年仅五六岁、营养不良的我，却终日要抱一个两岁的、圆滚滚的孩子，还得不停地晃动，不然孩子就哭闹。我经常累得膀子麻木，抬不起来。

一个夏日的夜晚，天气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，五婶躺在室外的竹床上纳凉。她敞开衣襟，脱掉高跟鞋，双脚跷在高椅上，手里不停地摇着蒲扇。我照例抱着堂妹，边走边晃。又热又累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实在走不动，想停下来歇一会儿，不料堂妹尖叫起来。五婶蹭地从竹床上跳了下来，对我拳打脚踢：“你把小和怎么啦？为什么站着不走了？看我不打死你！”我无力反抗，只难过地望着天上的点点繁星，泪如雨下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你看得见你的女儿在受罪吗？

堂妹吃用穿戴一应俱全，最使我羡慕的是她的那对象牙色的小手镯。一天晚上，趁堂妹睡熟，我从她腕上取下一只戴在我的手腕上，上床之后还久久地抚摩它，心想，如果妈妈在，一定也会给我买的。我打算第二天抱堂妹时再把手镯给她戴上，这样，就什

么事情也不会有了。谁知第二天一大早，五婶就扯着嗓子问：“镯子呢？”这下糟了！我哪里敢吭气儿？五婶发现了我腕上的镯子，拿起竹板劈头盖脸朝我打来，恶狠狠地骂：“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！”

我们经常因五叔的工作变动而更改住处，北碚公园是住得最久的地方。这是个依山而建的公园。从山下进大门，顺着宽阔的、石板铺就的阶梯向上，要走近千步才能到达山顶。道路两旁是修剪整齐的松柏，彩色鹅卵石镶嵌成的各种图形的小路环绕着层层梯田般的花坛，月季、玫瑰、茉莉、栀子、桂花、山茶……四季飘香，山顶上浓荫蔽日，繁花似锦，曲径通幽，公园不大，但是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却应有尽有。登高望远，嘉陵江水在脚下缓缓东流，北碚镇区尽收眼底，清风徐来，使人心胸顿开，烦恼俱消。我常常偷空跑到这里来。也只有在这里，在这一片宁静之中，我才能暂时为自己抚平心灵的创伤，全然不去想回去后会遭到怎样的虐待，只尽情地陶醉于美景和遐想之中。

堂妹晚上跟五婶睡。这本是我最轻松的时候，可我真怕回到那间阴森恐怖的大屋里去。怕什么，是神？是鬼？我也说不清楚。这是一间堆满杂物的仓库，蜘蛛网密布，散发出阵阵霉味。我睡觉的一张小木板床就摆在从杂物中挤出来的角落里，窗户紧挨通往山顶的小路。

为了拖延回大屋的时间，我经常在公园稀疏的路灯下游逛，那里的每个角落、每条小路我都熟悉，所以没有危险，没有惊恐，更何况还有如织的游人。夜来香浓郁的香气弥漫在夜空，沁人心脾。明月高悬的夜晚，如水的月光洒向大地，朦胧中的公园更加迷人，更加静谧。这时候，我常把自己想象成树上的精灵，花中的仙子，自由自在，尽情翱翔……可是，劳累一天的我很快就会犯困，不得不去睡觉了，因为第二天一早起不来，又要挨打。

一回到黑黝黝的大屋，我立刻又成了寄人篱下、挨打受气的小丫头。我钻进被窝，蜷缩着，蒙住头，屏住气。窗外的脚步声，四川大耗子碰撞东西的响声和“吱吱”的尖

叫声，吓得我胆战心惊。

五叔那时候难得在家。一次他回来，偶尔发现我脸上、胳膊上的伤痕，便掀开我的衣服，看见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不知他对五婶讲了什么，他走以后，我又挨了五婶一顿毒打。不过，五婶再不打我的脸和胳膊，她警告我说：“看你还敢告状！今天你别吃饭了，饿不死你！”

弟弟也和我一起在五叔家住过，只是时间不长。五婶一打他时，他就边跑边喊：“不敢了，下次不敢了！”而我，任凭五婶怎样拳打脚踢、又拧又掐，甚至棍棒相加，我都咬紧牙根，一声不吭，既不哭，也不跑，更不求饶。五婶经常连打带骂：“看你犟！看你不服软！看我打不死你！”直到她打累了，把我踹倒在地扬长而去以后，我才躲进树丛深处，抚摩着累累伤痕，失声痛哭。每每在这个时候，我更加想念死去的妈妈，想念不知去向的爸爸。

1941年到延安以后，我曾向爸爸哭诉过受五婶虐待的情形，当时爸爸眼圈红了，连连说：“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这样？我留

给了他们一大笔钱——三百块银圆，又不是让他们白养！”

1959年，我到成都看么外公，一位亲戚对我说：“你五婶和你五叔已经离婚，你五婶现在当缝纫女工，她想见你，她说你们过去有些误会。”误会？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无数次的毒打，难道是误会？几十年来，我最不愿意回想这段苦难生活，我想忘记它，可又怎么忘得了？我的手脚颤抖，心在流血。我没有能撑船的宰相肚量，也没有能出口恶气的唇枪舌剑，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采取回避的态度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见我，也不明白她怎么会有脸面对当年几乎被她折磨死的她的前夫的侄女！

不过，这段苦难的生活，倒养成了我的性格：倔强，富有同情心，爱憎分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倒应该感谢这位五婶。当然，后来我也认识到，我童年的生活遭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悲剧，在那个时代，为了革命事业，许多革命者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庭，因此许许多多的革命后代都遭受过种种磨难。土地革命时期，我在延安中学时的同

学林汉雄的父母，因为急于转移党内机密文件，没来得及将女儿抱走，残忍的敌人竟把他们的女儿——一个出世不久的婴儿活活抛入滚开的油锅！所以，应该说，中国革命的成功，也包含着幼小的革命后代的付出和牺牲。

解放后，八姑婆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1938年冬天她曾专程到北碚看我，见我面黄肌瘦，大冬天，没穿鞋，手脚冻得又肿又皴，她流泪了，当即给我买了鞋子和衣物。回去后，将我的情况禀报给了她的父亲——妈妈的祖父杨淮清。这时候妈妈的父母已经去世，杨淮清老人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成都，让我们在八姑婆任教的小学读书，和八姑婆住在一屋，假日随她一起回家。那时八姑婆还是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。从此，我离开了凶狠的五婶，结束了苦难的生活。

在五婶家，我的头上长满了虱子，到成都后，剃了个光头。八姑婆经常提起我那时写的一篇作文里的一段话：“春天到了，万木复苏，可我的头发什么时候才能像抽芽的柳枝那样长出来呢？”

在成都住得时间不长，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，我又被送到老家——岳池县，寄居在三伯母家。

三伯父是北大学生，不幸患肺病早逝。寡居的三伯母独自带着两个儿子。我经常听她声泪俱下地诉说受族人欺负的情形。三伯母的长子，后来成为版画家的刘旷到延安不久，我和弟弟就来到了她的身边。善良的三伯母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我们姐弟身上。四川的房屋，似乎都很高大昏暗，可是有三伯母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晚上早早地就上床，躺在三伯母怀里，听她讲我的爸爸，讲她只见过两面的我的妈妈，讲她到陕北上“抗大”的儿子刘旷，讲他们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……在三伯母家居住的半年时光中，我真正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瘦小的三伯母熬夜等待蘸红糖水吃的粽子出锅时的身影，新苞谷粑粑的清香，家制腊肉的美味，躲轰炸时从岳池后山公园里飘来的熟悉的夜来香味，在三伯母面前撒娇的情形……一切的一切，一切都使我感到亲切。

我是什么时候再见到爸爸的，记不清

了。到延安之前，似乎只见过一两次。只记得每次见面，爸爸都是匆匆忙忙，在一起呆的时间极短，而且他总是显得神秘。后来听爸爸讲，我和弟弟的生活其实都是他安排的。爸爸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，但不管是远在异国他乡，还是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，就是在躲避敌人的通缉追捕、居无定所的时候，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失去了妈妈的一双儿女。

1939年夏，我和弟弟离开了岳池，离开了慈祥的、母亲般的三伯母，乘鸡公车，坐滑竿，跋山涉水到了重庆。弟弟去保育院，我进了育才学校。从此，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